

# 批判思考： 後疫情「兩難」時代的智慧與愛

賴俊雄\*

## 一、前言：思考，在瘟疫蔓延時……

檢視當前後疫情時代下所形塑的嶄新生命樣態，我們正面臨著急需批判思維的生存處境。美中新競爭時代的局勢仍動盪不安；百年建立的全球化供應鏈斷成碎鏈重整中；科技引領的「快閃」未來充滿不確定的「巨變」—— COVID-19 疫情的衝擊更是雪上加霜。身處於全球「巨變」的新生命樣態，批判思考已成為追求生命卓越與關懷的基本配備。何謂批判思考？中文「批判」兩字，常被誤解為挑錯、責罵與找碴等行為。事實上，「英文 critical（批判性）意指著對某一事物進行『縝密檢視與評斷』。批判思考乃藉由積極謙遜的態度以及審慎的思辨與提問，對『已知』的不懈質疑，對『未知』的執著追問。在中文語境中，批判思考即是『慎思明辨』的實踐」(15)<sup>1</sup>。要言之，批判思考乃認真思考、分析與明辨「不合時宜」的價值假設、「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或「似是而非」的錯誤推理等，進而做出正確判斷與決定的一種思考模式。此思考模式能協助我們，將網路世界中唾手可得的海量「知識」，轉為具高度慎思明辨的獨特「見識」。是以，批判思考能力在訊息不足、混亂不安與兩難困境時顯得特別重要。在瘟疫蔓延時，許多長久建立的價值系統被不斷拉扯與考驗。在瘟疫蔓延時，日常慣用的思考框架被不斷拆解與重建。在瘟疫蔓延時，許多決策判斷的「兩難」困境也一一浮現<sup>2</sup>。限於篇幅，此文將以批判思考的人文角度，探討後疫情時代下兩項「兩難」的困境。

\*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sup>1</sup> 本文中的三處引言引用自筆者近作《批判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中的序〈開講前：批判思考與愛〉（臺北：聯經出版，2020年）。

<sup>2</sup> 例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指出，當代科技不是單純的使用「工具」，而是人類存有樣態的主宰「框架」。後疫情時代，去除「距離」的 AIoT 科技將更主宰全球人類的整體生命樣態。該如何適當迎接與抗拒科技主導的資本主義框架，將是一項艱困的人文兩難新處境。

## 二、回應危機「兩難」的批判思考

當面對全球性的緊急危機時，人們將面臨「民主」與「獨裁」的兩難。2020 年爆發新冠肺炎，其規模與衝擊可稱是人類的世紀性大瘟疫，也帶來一場世紀性的全球危機。特別的是，此次瘟疫別於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大型瘟疫，爆發在二十一世紀「人」、「物」與「經濟鏈」高度緊密連結的全球化世界，造成此次疫情彷彿炎夏的星火燎原——確診、死亡、封城、鎖國、戒嚴、隔離、懲罰等不斷重複上演。當代政治哲學家喬治·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於 2020 年 8 月的採訪中<sup>3</sup>，發表了對於疫情政策的民主批判觀點。由於義大利在疫情擴散之際，頒布一項緊急的法律，禁止舉行葬禮。醫院須將往生的遺體立即送至墓地，讓亡者一個人孤獨地入土。阿岡本認為患者孤獨的在隔離病房中永離人間，且家屬因而無法替親人哀悼送行是相當不恰當的政策。對阿岡本來說，義大利政府處理疫情的方式如同軍隊一般，其對抗病毒感染為由而採取的緊急措施，坐實了「例外狀態」(state of emergency)(如戒嚴令)常態化的治理模式，嚴重侵犯人民的自由與人權。如同西元 1933 年，希特勒在德國即位時初次宣布的「例外狀態常態化」一般，如今疫情中的許多西方民主制度國家已然成為極權統治的鐵幕。作為一位哲學家，阿岡本知道自己無法提出醫學的專業見解，但他必須針對政府及媒體處理疫情的措施與方式提出批評。他對於此次的疫情提出了質疑：「如果現代社會最重視的是身體的健康狀況，那人民是否該在此例外狀態中被降為裸命 (bare life) 呢？」此外，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當局制度更能掌控疫情的散播，但阿岡本認為此言論相當不負責任，因為中國並非享有民主、人權與自由的國家，不能對等視之。他認為民主制度的政府必須是脆弱，且能被輕易推翻。對阿岡本來說，多數人誤以為民主的基底是愛與團結，但其實民主社會的特色是多元、差異、距離、猜疑，甚至是仇恨對立。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若我們依賴多元民主共識來尋求解決病毒危機的模式，可能導致領導者與追隨者陷入僵化的「團體迷思」(groupthink) 與「結果偏誤」(outcome bias)，使人們低估重要警訊，錯失防微杜漸的良機，甚至採取錯誤的行動。必須承認，眾多西方的民主大國，面對疫情擴張的緊急危機時，仍依賴民主的「團體迷思」，即帶來極大的危機風險。「團體迷思」是團體在決策過程中一個集體錯覺的心理現象。團體成員常傾向讓自己的觀點與團體的價值觀一致，因而令整個團體缺乏批判思考的角度，難以對事件進行客觀的分析。

---

<sup>3</sup> 參見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August 2020”。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67\\_5upU55o&ab\\_channel=PrNeix](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67_5upU55o&ab_channel=PrNeix)

此外，大眾（甚至不少領導者）的「團體迷思」常源自「結果偏誤」的思維模式。「結果偏誤」即基於先前決策的結果作判斷，而非依據此次事件決策本身的具體品質與過程，也因此導致判斷產生系統性偏誤。換言之，「若結果能合理化手段」，那就是好的判斷，這個普遍說法反映了「結果偏誤」的迷思。以此次的新冠疫情為例，過去二十年發生過不少類似新冠病毒事件，造成許多西方民眾「結果偏誤」的錯誤認知。具體來說，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及亞洲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的控制結果，讓全球的大眾與政策制定者獲得不實的安全感，誤導他們以為現有的應對措施足以控制此一新冠病毒，甚至拒絕在公共場域戴口罩。必須承認，此種以「結果」作判斷的偏見常根深蒂固在我們的大腦中。結果偏誤讓民主「團體迷思」在作決策時，無視潛在的巨大風險，最後會導致世紀性災難的發生。蘇格拉底的「認識自己」格言告誡我們要時時意識到自身的偏見觀點。在此次疫情的案例中，「認識自己」意味著要牢記當再次檢驗過去全球病毒爆發所作的應對時，過去的「結果」並不足以作為回應當前危機的充足決策「手段」。

如是，新冠疫情督促我們在處理全球危機時，須成為一個謹慎、可變通且主動的批判思考者。慎思明辨當下危機的「獨特」現實，避免掉入「民主」與「獨裁」僵化的二元對立思維。當面對與回應疫情危機時，有別於傳統大眾與領導者愛好「站在對的立場」，批判思考更著重「做對的事」。衡量「站在對的立場」與「做對的事」兩項原則的優劣，需先釐清、瞭解與探討其潛在的各種風險。在疫情爆發的威脅下，面臨千百萬人民的生死關頭，你會針對感染的無症狀患者，在症狀出現前會傳染病毒的研究採取應對，或選擇相信國內還沒發現任何證據，且還在持續證實中的消息？若「站在對的立場」更為重要，那人們都會想相信過去的價值系統與經驗法則。相對的，著重「做正確的事」的批判思考能使人謹慎思考與分析客觀的資訊，評估錯誤時所需付出的種種代價。例如，當初美國政府如果善用其批判思維，並「做正確的事」，像臺灣快速採取慎思明辨的行動，疫情在美國境內的發展便不會那麼嚴重。美國川普政府此一錯誤的判斷乃造成目前美國人近三千萬感染及近五十萬死亡的主因之一，成為全世界疫情的第一超級重災區。回應攸關生死的危機與兩難，批判思維絕對有其必要性。

### 三、生命意義「兩難」的批判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後疫情的巨變時代，全球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生命底蘊的意義，一種災難後的生命思考困境：「悲觀」或「樂觀」的兩難。從現象學的角度

而言，生命的「絕對被給予」(absolute givenness)賦予了生命「任何意義」的基石。自古以來，人類有三個「絕對被給予」的神祕框架。首先，我們在未被徵詢的情況下，來到一個被絕對給予的出生世界(時空框架)。然後，被固定在一個無從選擇、被絕對給予的肉體中(形體框架)。最後，還注定要面對與接受一個此生被絕對給予的「屬我」死亡(生命框架)。面對這三個絕對框架還不夠，我們被給予的神祕內在生命與動態外在世界之間，永遠都充滿一定程度的無明、無常與無盡的驚異(如新冠肺炎帶給全人類的全體性衝擊)。與此同時，這世界巨大豐富的多樣生成性，卻又提供生命不斷理解、思考、超越或逃離此三項「絕對被給予」框架的無限想像與希望；人類的知識與文明於焉形成，並且不斷開展、生產與體制化。如是，在後疫情時代，面對生命「絕對被給予」的三項框架(悲觀)與世界「豐富多樣生成性」的開創慾望(樂觀)之間的矛盾兩難，我們該「為誰而戰」，又該「為何而戰」？

活著對死亡的「倫理」渴望與開展，成為此刻面對上述「兩難」的人文關懷基底。誠然，死亡是哲學的永恆議題。死亡乃生命的第一絕對神祕「他者」(the Other)，法國倫理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如是說。列維納斯提醒我們，一個人活著的意義與責任，就是建立不斷回應他者的召喚的能力(Responsibility is “an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calls of the Other)。死亡作為生命中絕對被給予的神祕他者，不斷迫近使「我」無所遁逃，漫天漫地惘惘地威脅著「我」。在後疫情時代，一切對死亡的「知識」其實都是次要的。因為死亡的「感知」以更迫近之姿挾持著「我」，無時無刻地凝視著「我」，而「我」卻無法回視。一方面，因為「我」無法理解及掌握死亡；另一方面，因為沒有一明確可作為相對抗之物或場域。死亡的時間基進他異性難以被語言化，這並非因為「我」對死亡可能瞭解不足，而是因為它根本不存在任何語言界域之內，遂無法被「我思」駕馭。

無所不在的病毒時時警醒我們，生命如此無常脆弱。疫情過後，務必重新認真思考與檢驗，什麼才是此生活著最重要的事？如是，在後疫情時代，好好珍惜身邊所愛的人與土地的浪漫想法，更具體回應生命深層的批判理性。從抵拒死亡而換來的生存時間裡，全球後疫情生存者須藉由「為他者」之舉，方能重燃災難困境後的生命意義。我們可以說，此刻思考死亡的意義，使「我」與「他者」得以開展更深厚倫理的友誼關係，進而使生命有了在黑暗中用思考「點光」的更高人性可能。

#### 四、結論：愛，在瘟疫蔓延時……

判性理論看似一支支理性的巨鏈，不斷挑戰權威，強調差異，但其嚴謹理性論述背後都有不同形式倫理的「愛」。左派知識分子如德希達、史畢娃克、阿岡本、紀傑克、巴迪烏以及反威權的理論家如傅柯、德勒茲、薩伊德、巴特勒、布莱多蒂等，其批判哲思展示的不只是對「智慧」的熱愛 (love of wisdom)，更是對「愛」的智慧 (wisdom of love)。在愛的智慧中，批判思考才會有生命，才有人性，才有想像，才有關懷的溫度與正義的色彩。(19)

我們可以說，「批判思考」是一種「愛」的產物。回顧許多時代性基進的批判思考，讓人類得以在其「亂世」、「亂事」與「亂是」中，有值得不斷堅持的信念與努力；在嘗試回應內心對愛、善、正義與死亡等他者召喚時，有自我卓越的雀躍、有倫理關懷的開展。細細思量，一株微小的 RNA 病毒，竟逼現出當前人類欠缺批判思考「體質」的眾多問題。此外，病毒可以是一株有外套膜之單股正鏈 RNA，也可以是一個意識形態、仇恨或想法。此次全球共同防疫過程中，不少世界各地的網路鄉民拿香就拜，跟著媒體風向或網路訊息作主觀偏激的發言，以為自己也有「批判」的想法。「專業防疫」遂成「敵意防疫」。在「思想瘟疫」蔓延時，身為一個當代的國際公民，應時時提醒自己，強化自我理性思考的紀律及反省的勇氣，避免輕易被植入特定「仇恨」情緒或某種「懶人包」意識。事實上，時代性的批判思考並無外在標準答案，也非一蹴而成，尤其是在瘟疫蔓延時……。

必須強調的是，「如果理性的思辨與正義的爭論是批判思考的言說手段，而愛的關懷才是其意圖，那麼批判論述在公共場域（如社群媒體）中有如一把火『屬己』，批判思考者須搭配（同時也提升）成熟的性格、堅定的勇氣與國際的視野，來駕馭運用這把火，照亮真實與關懷。避免淪為把手段當目的的『自以為是』、『為批判而批判』或『得理不饒人』等」(20)。亦即，經過此次世紀瘟疫的災難衝擊後，若要面對各種新舊價值巨大拉扯的兩難，強化自身的批判思考能力，我們需先學習提升批判理性背後的愛與智慧。在災難事件後，我們應領悟當代多元批判思考不斷對話與思辨的終極目的，是為開展更高層次的人性關懷，進而開創更友善與更正義的跨國共群社會。在後疫情巨變的時代，「我」與「他者」之間將具有更高度的張力與潛能。「我」的應變能力唯有在「共在」存有 (Being-with) 中，方能有更高的自我卓越雀躍、有更廣的人文關懷開展。面對疫

情後各式新生命的「兩難」處境，深刻反思如何積極培養時代性的各式批判性思考與愛、如何開展對「愛」的當代性智慧、如何再進一步創新人類存在的價值和人性的高度，正是時候。